

从被规训到生成“佐伊”：《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后人类主体性



许文卓, 王素英*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24

摘要: 主体性作为哲学与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个体之自我认知和道德地位及其存在意义的根本基石, 也是个体享有生命尊严与权利的内在依据。随着基因技术、生物技术、认知科学等前沿科技的发展, 在后人类语境下, 主体性问题再次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创作的长篇小说《别让我走》以克隆人群体为叙事核心, 深刻描绘了其生活轨迹及作为人类器官捐献者的悲惨宿命。小说透过克隆人主人公凯茜的视角, 展示了克隆人群体抵抗被给定的牺牲者命运, 努力追寻和建构自身主体性的过程。本文基于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主体性理论, 分析小说中克隆人试图摆脱其被给定的异化身份和工具化身体所导向的牺牲者命运, 并通过解辖域化的游牧抵抗以及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关联而生成纯粹生命“佐伊”, 从而呈现出其后人类游牧主体性。通过描写克隆人群体对自身主体性的追寻, 石黑一雄在该作中表达了对克隆人的悲剧命运以及克隆技术所引发的科技伦理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 《别让我走》; 克隆人; 后人类主体性

DOI: [10.57237/j.ha.2025.03.001](https://doi.org/10.57237/j.ha.2025.03.001)

From Being Disciplined to Becoming “Zoe”: The Posthuman Subjectivity of Clones in *Never Let Me Go*

Wenzhuo Xu, Suying W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As a core concept in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 subjectivity holds fundamental importance in that it constitutes the cornerstone of an individual's self-awareness, moral status, and existential significance. It also serves as the intrinsic basis for their entitlement to dignity and righ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genetic engineering, biotech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the issue of subjectivity has become a key topic in academic discussions within the posthuman context. *Never Let Me Go*, a novel by the Japanese-British author Kazuo Ishiguro, centers on a group of clones, vividly depicting their life trajectories and the tragic fate as organ donors for hum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lone protagonist Kathy, the novel showcase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clone community resists against their given fate of sacrifice and strives to pursue and construct their own subjectivity. Based on Rosi Braidotti's theory of posthuman subjectivit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clones strive to escape from their fate as sacrifice caused by their assigned alienated identities and instrumentalized bodies, generate the pure life “Zoe” by means of

基金项目: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珍妮特·温特森小说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研究》(HB22WW002).

*通信作者: 王素英, sywang6@163.com

收稿日期: 2025-09-29; 接受日期: 2025-11-17; 在线出版日期: 2025-12-24

<http://www.humarts.net>

detritorializing nomadic resistance and establishing connections with other forms of life, and thereby demonstrate their posthuman nomadic subjectivity. By depicting the clones' pursuit of their own subjectivity, Ishiguro in this novel expresses his contemplation on the tragic fate of the clones and the ethical problems caused by cloning technology.

Keywords: *Never Let Me Go*; Clones; Posthuman Subjectivity

1 引言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2005年出版的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是他涉足科幻小说体裁的首次尝试。该小说一经推出，便被《卫报》等众多报刊媒体选入年度最佳图书之列，并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小说以20世纪90年代末的英国为背景，以克隆人为描写对象，讲述了一群克隆人在人类社会中努力生存却最终被人类暴力终结生命的故事。通过克隆人主人公凯茜的回顾性视角，小说向读者呈现了一幅克隆人作为人类器官捐献者的悲惨命运图景。

学界对该作品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小说的叙事策略、克隆人的身份认同与伦理困境等方面。拜尔（Byer）认为，主人公凯茜的叙述是不可靠的，它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来理解她生活的世界[1]。安婕分析了小说中独特的时间叙事模式所隐含的后人类生命伦理关系，揭示了小说体现的后人类伦理观[2]。庞好农从“悬念性、反讽性、阴冷性”三个层面分析了小说中体现的幽默叙事，指出这种幽默叙事“使读者在幽默的文本氛围中获得新的社会认知、哲理领悟与道德升华”[3]。伟钦森（Vichiensing）从后殖民理论中的“他者”概念出发，分析小说中的他者化（othering），揭示了作为他者的克隆人所承受的权力压迫性和身份焦虑[4]。杜明业直接从“身份认同”概念切入，系统分析小说中克隆人从身份困惑、身份追问，到最终接受作为牺牲品的身份认同的过程，指出克隆人的悲剧命运所透射出的悲剧色彩[5]。

作为一种非自然人，克隆人的主体性问题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讨论。戴尔·瓦勒·阿尔卡拉（del Valle Alcalá）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视角，审视小说中的主体性和劳动形式，强调“克隆人作为‘固定资本’而存在”[6]。克里斯莫斯（Christmas）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爱情理论出发，认为“爱是克隆人建构主体性的重要因素”[7]。克隆人作为以现代克隆技术制造的人工生命，成为典型的后人类形象。如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在其著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中所指出的，人类的科技产物“赛博格”“人工生命”等已成为“后人类”的标志[8]。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在其《后人类》一书中更概括性地指出“一个后人类的共识，即当代科学和生物技术影响了生物的纤维和结构，并改变了我们对于什么才是今天人类基本参照系的理解”[9]。也就是说，以当代科学和技术影响和改变我们关于传统上定义的人类概念的生物即为后人类。克隆人作为人类的生物技术产物，的确如布拉伊多蒂所说，影响和改变了我们对传统“人类”概念的理解，因而其后人类特征毋庸置疑。那么从后人类的视角反观石黑一雄《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主体性则应顺理成章。然而，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见。

关于后人类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布拉伊多蒂可谓一面旗帜。她在汲取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游牧思想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伦理理论等前辈理论家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后人类主体是游牧主体的论断，指出后人类游牧主体是“在精神思想层面可放弃所有固定执念——观念、欲望，怀旧的、可适应多元流动社会的、促进受排斥、受压迫他者走向解放的新型主体，关键在于凸显主体精神能量的充盈流动越界状态”[10]。她将后人类游牧主体概念置于“佐伊”（Zoe），即“普遍生命力”思想基础上，强调后人类主体“不局限于人类，包括所有非拟人化的元素，致力于打破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固化壁垒，以更为广阔包容的视野看待生命”[9]。本文以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主体性理论为视角，探究《别让我走》中克隆人从被规训中的主体性缺失，到解辖域化游牧抵抗中的主体性追寻，直至最终普遍生命力“佐伊”生成中的主体性建构，说明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对克隆人命运及其引发的科技伦理的思考。

2 生存中的双重规训：主体性缺失

小说中以凯茜为代表的克隆人虽然有着与人类外表相同的身体，但因其非自然的出生方式而被人类视为异类，并且其一出生即注定了被人类工具化利用的命运。因而在生存中他们经受着人类社会的双重规训：身份的异化和身体的工具化。这种双重规训使他们的主体性处于缺失状态。

2.1 身份的异化

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理性，重视人的尊严，通过人与非人的二元对立来排除异己。在《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群体不仅拥有与人类相同的身体，而且拥有相同的情感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通过人类的克隆技术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注定与人类不同，被视为异类的存在。人类通过空间的区隔布局、课程教育以及对克隆人的态度表明克隆人是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其身份是归于科技成果的“非人类”种属。

石黑一雄在小说中设定了两种对立的人物群体，一种是普通人类，另一种是为人类捐献器官的克隆人。从最初的黑尔舍姆寄宿学校、过渡期的村舍到最后的康复中心，克隆人一直被人类安排在封闭、偏僻、孤立的特定空间里。据凯茜回忆，他们一出生就生活在黑尔舍姆，“它位于一个四周都是高地的平整山谷中，任何车辆只能沿着砾石的小路，穿过灌木丛到达主楼前，有时候好多天看不到一辆车子沿着那条狭窄的路开过来”[11]。从凯茜所描述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黑尔舍姆被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故意隔开，远离人类生活交往区域。年满16岁后，克隆人需搬出黑尔舍姆，进入为期两年的过渡阶段。在此期间，他们需要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一篇论文。他们中的一部分去了村舍，另一部分去了威尔士山区的白楼或者多塞特郡的白杨农场。三个地点都处在边缘地带：村舍的前身为破产农场，白楼则位于山区之中，而白杨农场位于海峡北岸。当到了捐献器官的时间时，他们就被分配到英国沿岸的各医院和康复中心，在那里接受手术并进行疗养。即使在进行疗养的多佛尔康复中心和金斯费尔德康复中心，他们依然是被隔绝于外部世界中。小说的空间布局使人类和克隆人成为了差异等级的群体，前者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后者则处于边缘地位。

除地理位置特殊以外，“黑尔舍姆”的名字也具有特殊性。该词的英文“Hailsham”可拆解成“Hail”与“sham”两个单词。“Hail”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为“欢呼、呼喊”，“sham”为“假象、伪装”。两词可以合译为“欢迎假冒者”[12]，暗示了学生的特殊身份。克隆人的命名方式与普通人也有很大区别。他们的姓氏仅由一个大写字母组成，如凯茜·H、汤米·D等。甚至几个克隆人的姓氏是相同的字母，仿佛是工厂中流水线上同一批产品的编号。此命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克隆人是被复制、被生产出来的，其身份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此而被削弱。在黑尔舍姆，克隆人被多次告知身份的特殊性。在晨会上，埃米莉的训词中常常出现“不配享受特权”和“机会的滥用”等词汇。这些词汇暗示了克隆人身份的特别。监护人露西也在关于吸烟以及克隆人的未来展望的讨论中反复强调其身份的特殊性。监护人所采用的告知又未真正告知的方式，凸显了克隆人与人类的差异，克隆人的非人身份被不断强化。此外，克隆人被鼓励进行艺术创作，如画画、写诗或散文等。他们所创作的优秀艺术作品有机会被黑尔舍姆的创办者玛丽·克劳德夫人选中进入画廊展览，这是她和监护人埃米莉进行的一场实验。她们认为这些作品能够培养克隆人的灵魂，能够证明“如果将学生养育在有人道和有教养的环境中，那么就有可能成长为和任何正常人类一样敏感和聪明的人”[11]。埃米莉的实验从侧面揭示出，人类普遍认为克隆人没有灵魂和人性。她尝试从外部世界为克隆人争取获得人类认可的可能，但以失败告终。随之，黑尔舍姆被关闭。小说中，人类对克隆人的态度是恐惧和排斥，如玛丽·克劳德夫人每次见到克隆人都会“拼命压住身上的颤抖，害怕克隆人就像人害怕蜘蛛一样”[11]；而监护人埃米莉也承认看到他们会有强烈的厌恶感：“我们都害怕你们，在黑尔舍姆的时候我自己几乎每天都要强忍对你们的恐惧”[11]。真实的生理反应也暴露了人类对克隆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在这种被歧视的生存状态中，克隆人无法充分认识自我，难以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也无法获得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因而其主体性是缺失的。

2.2 身体的工具化

布拉伊多蒂批判生物资本主义将生命降级为可计算、可剥削的物质，克隆人正是该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牺牲品。他们的身体被视为可拆卸、可替换的器官容器，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医疗需求。

小说中的克隆人只有一个任务：向人类捐献器官。“捐献”一词在常规语境下指“个体自愿地将自身有价值的东西无偿给予他人”[13]。然而，在克隆人所在的社会体系中，“捐献”被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去主体化的行为。从出生到生命结束，克隆人的一生被严格规划，正如监护人露西所言，“克隆人到中年以前，就要开始捐献自己的主要器官，所有克隆人的未来都已定好”[11]。不仅如此，人类对克隆人的生理发育、身体健康等进行全方位管控。为确保捐献的器官健康，克隆人会进行体育锻炼，如跑步、踢足球等，且每周进行身体检查。另外，监护人对于吸烟持有非常严厉的态度，“他们更希望克隆人从未发现世界上还有抽烟一事，每次说及香烟时都作一番训话”[11]。黑尔舍姆中不会出现任何与烟草有关的东西，如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带有吸烟封面的磁带等，学校也会安排课程来介绍吸烟对人体内部造成的伤害。对于性爱，监护人教育学生将其当作特殊的事情来对待，发生性关系时必须十分小心地避免染病。因此，在监护人的严格管控下，克隆人被剥夺了自愿选择的机会，沦为被动的规则遵守者和执行者。黑尔舍姆中监护人的职责是教育克隆人并保证其身体健康，而康复医院中看护员的职责则是照顾和安慰那些正在经历多次捐献、身体逐渐衰竭的克隆人。看护员这一角色服务于克隆人成功捐献器官的核心目标，成为了克隆人器官捐献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进一步体现了克隆人的身体工具性。

石黑一雄将克隆人的死亡称为“完结”，反映了克隆人生命的工具性特质。人类认为克隆人的“完结”是作为器官供体之使命的终结，而不是生命个体本身的终结。这意味着克隆人必须要把自己的所有器官都交给人类，没有剩余。“除了眼睁睁看着你余下的捐献手术，你没有什么事可做，直到医生啪的一下把你的身体关上为止”[11]。只要克隆人还活着，还没有给出一切，他们就不完整。只有在完成捐献的一刻，他们才获得了“完整性”。人类社会将克隆人限制在作为器官供体的单一角色中，使他们无法展现出独立的人格特征，其主体性由此被剥夺。

3 解辖域化游牧抵抗与联结：主体性追寻

克隆人在身份异化和身体工具化所产生的主体性缺失状态中努力追寻自身的主体性。他们一方面通过

回忆和寻找遗失物实现了多维时空中的解辖域化；另一方面又通过与其他生命形式的联结创造出一种富于情感和意义的生存方式。在解辖域化的游牧抵抗以及与其他生命形式的联结中，他们踏上了对自身主体性的追寻之旅。

3.1 多维时空中的解辖域化

“辖域化”是一种“被禁锢或圈禁的状态”[14]，“解辖域化”则指“脱离辖域，趋向大地的运动；打破壁垒，超越边界从而趋向无所羁绊之境的动态过程”[15]。虽然克隆人被人类预先安排在封闭空间内，按部就班地按照人类所规定的出生—成长—捐献器官—死亡的顺序生活，但他们却利用回忆和对遗失物的寻找实现了时间和空间层面的解辖域化。

布拉伊多蒂指出，后人类时间是一个非线性系统，“多个时序内容会产生分裂”，展示出“游牧性质”的“流变生成的生命力”[16]。《别让我走》以凯茜的回忆为主线来展开故事情节。小说中包含着两个叙述者，一个是讲述过去经历的叙述者“我”，另一个是处于过去事件中的经历者“我”。叙述者“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不同时间来回跳跃，打破了线性的叙事策略，构成了对传统时间的抵抗。在小说开头，凯茜向读者交代了自己的基本情况：31岁，是一名工作11年多的看护员。这是书中的“现在”时间，此时凯茜的伙伴汤米、露丝都已经因捐献而去世。她回忆起童年在黑尔舍姆时期的场景：“我继续开车，而思绪却已神游别处”[11]。“我现在想到的是在那个下午，我们正站在方凳和长条凳上，一堆人挤在高窗户下面”[11]。叙述者“我”的回忆基于“现在”回顾“过去”，打破了时间的线性发展，主要讲述童年时期她们看汤米踢足球时的情景。这时，时间又跳回到了“现在”，讲述“现在”的我对当时自言自语评价汤米穿着衬衫踢足球这件事的感受：“我认为当时没人听见我的话，因为他们都在对着劳拉发笑”[11]。如评论者所说，“这并不是单地从现在到过去的转换，而是现在与过去的两个时间维度发生了重叠，故事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变得更加复杂”[2]。“汤米在那一刻展现出了某种滑稽的表情，他让人想到，如果他真的那么傻，那么后来的事情他就活该”[11]。此句包括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间维度。“过去”——汤米滑稽的表情对“现在”产生了影响，使得“他让人想到如果他真的傻”，而“现在”又唤起了“将来”——“后来的事情他活该”。在交易会的情节描述中，作者实现了现在与过去

的时间共存。“我在这里应该解释一下我们在黑尔舍姆的交易会...” [11], 在凯茜继续回忆汤米时, 她转向了现在, 开始向读者介绍什么是交易会, “现在”介入了“过去”之中。在村舍, 克隆人对于收藏品的处理情节也展现了过去与现在不断交织的关系。凯茜在回忆她与伙伴露丝关于藏品的对话时, 叙事时间由“过去”转向“现在”: “我现在要说的是, 我们所有的人当时都在力争适应新的生活” [11]。之后, 她的思绪又从“现在”转向“过去”——“露丝的话当时真的让我很不安” [11], 随后又转向“现在”的评判——“现在去评判她或是其他人在村舍最初的日子里的表现, 都是毫无意义的” [11]。石黑一雄的叙事手法使回忆不固定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 而是在时间中不断流动和演变。同一段过去在被“现在”的眼光审视时, 会呈现出不同的理解。凯茜的思绪在人与事件之中来回流动, 构建了她和其他伙伴在黑尔舍姆、村舍以及康复中心的记忆。凯茜的回忆式叙事打破了人类为克隆人所规定的从出生、成长、捐献器官到死亡的线性时间顺序, 构成了时间层面的解辖域化。

在空间层面, 人类精心地为克隆人的生活划定边界, 而克隆人却在边界处寻求突破。小说中凯茜等人去诺福克郡寻找“原型”之旅正象征着对空间的逃逸线探索。为了让克隆人了解外部世界, 埃米莉小姐在黑尔舍姆拿着地图和照片逐一讲解英格兰各郡, 但始终未展示诺福克郡的照片, 增添了一些神秘色彩。在村舍的第一个冬天即将结束时, 克隆人群体之间传出了“可能原型”理论, 找到原型就能洞察内心的自我且预知未来。因此, 凯茜面对自己强烈的性欲, 认为原型与色情杂志中的人物一致, 而露丝则坚定地认为她的原型工作在繁华都市中的写字楼里, 处理各种事务。克丽西和罗德尼声称在诺福克郡见到了露丝的原型, 从此汤米、凯茜、露丝、克丽西、罗德尼五人一起踏上了寻找原型之旅。他们离开了村舍, 来到象征“异质空间”的诺福克郡, 不断在逃逸中寻找意义, 形成动态的自我认同。在诺福克郡寻找原型赋予了他们一种身份抗争性: 即便最终无法改变作为捐献者的命运, 他们在逃逸中的每一次尝试都成为对既定身份的持续否定与抵抗。凯茜和汤米一直记得诺福克郡被称为“英格兰失落之角”, “在英格兰捡到的所有失物都会被送到那” [11]。他们走进了旧书店、唱片店、旧照片店等各种旧货商店, 最终找到了曾在黑尔舍姆丢失的磁带, 也意味着找回了童年时期“在子虚乌有中创造的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11]。通过对遗失物的寻找, 克隆人重新确

立了“可拥有完整记忆与情感的主体性” [17]。除此之外, 凯茜的驾车之旅也构成了一条游牧抵抗的地理路线。在凯茜成为看护员之后, 她不属于任何一个固定机构, 而是驾车在各个康复中心及克隆人捐献者之间不断移动: “我在乡间驾车时, 可能从薄雾笼罩的田野的一角通过, 或者从山谷的一边下去, 或开过伍斯特郡的一片空地” [11]。凯茜通过驾驶汽车, 穿梭于各个地点, 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游牧空间。在此期间, 她拥有了之前被剥夺的自主权, 能够自主选择去哪里, 看望谁, 停留多久。

3.2 与其他生命形式的联结

布拉伊多蒂指出, “游牧思想向包括无机物在内的所有生命发出邀请, 使它们能够感知自身的情感冲动” [18]。因此, 游牧主体从不惧怕差异, 也不会驯化差异, 它们会向差异张开怀抱, 在“具身的和嵌入的物质结构中不断地捕获和转换、影响和被影响, 与非人类动物、植物、无机物形成关系并向其生成” [19]。在《别让我走》中, 克隆人与其他生命形式间的关系打破了物种间的界限, 构成了对“投机性的生命跨物种商业化” [18] 的抵抗。

在黑尔舍姆, 尽管汤米的画作一直被同伴们嘲笑, 得不到监护人和玛丽·克劳德夫人的认可, 但他仍默默地日复一日地坚持自己的动物画作。“细长的血管、交叉的筋腱、微型螺旋体和轮状物都以过分的精确画了出来” [11]。汤米的画作捕捉了动物的姿态, 象征着克隆人对自由和身份的渴望。此外, 克隆人与画作之间建立起独特的情感联结。“即使它们看起来有些眼花缭乱和生硬, 但它们每一幅都令人感到可爱, 甚至脆弱。在创作时, 他担心它们如何保护自己” [11]。汤米对画作中的动物的担忧也反映了他对自身处境的担忧。克隆人在主流社会中被边缘化, 时刻面临着身体被剥夺、主体性被否定的威胁。汤米与画作之间的情感联系超越了画作本身, 证明了即便生命被缩短, 克隆人仍拥有超越性的审美与情感体验。

在北威尔士的海滨小镇, 凯茜沿着海边的公路行走, 看到一个穿着像小丑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把气球。她注意到, “那些气球有脸还有漂亮的耳朵, 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小的部落, 在等待他们的主人, 同时在他头顶的空中上下窜动着” [11]。她跟在小丑后面, 继续观察着: “那些气球一路上始终跳跃着, 上面画着的人脸则咧嘴朝我笑着” [11]。凯茜通过观察与想象赋

予了气球生命力并向其投射了内心的情感，同时她担心气球会因绳子松动而飞走。绑着气球的绳子象征着将克隆人彼此相连、充满回忆和归属感的黑尔舍姆，而她的担忧也表明对黑尔舍姆被关闭的传言的恐惧。因此，她在赋予气球生命力并与其共情的同时，也在关切着整个克隆人群体的命运。

当代学者认为湿地是人类和非人类的保护性肥沃土壤。芭芭拉·赫德（Barbara Hurd）等自然科学家进一步将沼泽地视为“探索心灵的生产领域”[20]。《别让我走》中，沼泽地成为克隆人在回忆中探索心灵的地方。露丝第一次捐献后，她与汤米和凯茜来到一片空旷的沼泽地，参观了一条被搁浅的船。“船的油漆已经剥落，还有小船舱的木结构也都碎裂”[11]。石黑一雄将其描绘成一个聚集了黑尔舍姆回忆的地方。“我奇怪它是怎么到这里的”[11]，凯茜对船之来源的疑问浮出水面。汤米则认为它或许就是倒闭后的黑尔舍姆。“事实上，这个样子和脑海中的情景颇为相像。当然那情景里没有船。如果它像现在这个样子倒不是太糟”[11]。汤米将黑尔舍姆重新想象成了一片开阔的沼泽地。他对黑尔舍姆的设想引起了露丝对黑尔舍姆梦境的回忆：

“外面的一切都被水淹了，就像一个大湖。可以看到垃圾从窗户下边漂过，空饮料箱子以及所有的东西。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惊慌或是类似的感觉。

那真是又安静又漂亮，就像这里一样。我知道我没有危险，它会那样就因为它已经关闭了”[11]。

在露丝的梦中，黑尔舍姆的绿色土地变成了湖泊般的湿地。克隆人们没有试图改变沼泽和搁浅船的荒凉状态，也没有被环境的差异所束缚，而是在其中找到了与黑尔舍姆的连接点。他们找到了暂时的归属感，它并非来自于对自然的征服，而是来自于与自然元素的融合。他们将自己与空旷的沼泽地及对黑尔舍姆的回忆融为一体，创造出了富有情感和意义的存在方式。

从解辖域化游牧到与其他生命形式的联结，克隆人找到了建构其主体性的可能性。

4 生成“佐伊”：主体性建构

布拉伊多蒂在后人类理论中区分了两种生命概念，一种是西方文化传统定义的“生命”（bios），“即以人的自我形象为核心，人被视为生命的原形，人的核心特征如情感、意志等被投射为生命的核心特征”[21]。另一种则是“佐伊”（Zoe），即“非人类、前人类，或动物生命中的生成性生命力”[22]。“佐伊”概念致力于“打

破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固化壁垒，以更为广阔包容的视野看待‘生命’现象”[21]。完成器官捐献后，克隆人实现了对生命的肯定，即是对生成性生命力“佐伊”的肯定。

克隆人一开始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就是捐献器官，为人类延续生命。“整个世界的人都不想得到提醒捐献项目是怎样真正运作的”[11]，他们只关心“绝症被成功治愈的成果，甚至相信器官是无中生有而来的或者是从真空中培育出来的”[11]。然而，通过解域化的游牧抵抗以及与其他生命的联结，克隆人逐渐打破被动捐献器官的牺牲逻辑，开始思考自己的生命意义。他们去诺福克郡寻找原型，去海岸边欣赏风景，去沼泽湿地观察搁浅的船，这些皆体现了他们与自然相互交织的生命状态。自然环境成为他们生命表达的背景和媒介，而他们的生命活动也为自然增添了新的意义。他们对“捐献延期”和画廊理论的深信不疑和尝试，也表明他们对人类所安排的命运的不服从。

小说结尾，延期捐献的幻想破灭成为克隆人彻底觉醒的重要部分。真相大白后，凯茜跟着汤米，发现他站在泥地中间，狂怒着，喊叫着。她朝他走去，但两人都陷进了烂泥中。身体与泥土的接触凸显了他们流离失所的真实状态，但当下他们不是孤独的。“我伸手抓住了他挥舞的双臂，紧紧地抱住了他，他的双臂也正抱着我。于是我们站在那片野地里，站了很久很久，一句话没有说，只是彼此相拥，此时风还在不断地向我们吹着”[11]。在泥泞与狂风中，凯茜与汤米紧紧相拥，将对命运不公的否定性力量转化为肯定，即他们的存在意义被剥夺后，对生命本身的肯定。在凯茜十一年的看护员生涯中，她态度积极，细心照料捐献者，合理应对一切问题。而其他看护员意志消沉、自暴自弃，只是在应付时间。当事情变得糟糕时，他们开始感到沮丧并自责。尽管捐献者的命运是注定的，但凯茜并没有因此而敷衍或忽视他们的需求。相反，她尊重他们的意愿，维护他们的尊严，给予他们鼓励和情感支持。因此，她所照料的捐献者的身体康复状况优于预期，情绪十分稳定。她认为即使在捐献器官这一不可避免的命运面前，生命依然值得被认真对待和呵护。小说最后，她决定不再做看护员，而是成为一名捐献者。她没有哭泣，没有失控，而是转身回到车上，驱车朝着人生的终点驶去。她在接受从看护者到捐献者命运时所表现出的平静，不是被动服从，而是通过向死而生实现了对生命的肯定。

露丝在第二次捐献后，脸上流露出与其他捐献者相同的表情。“她期望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到身体里面，

这样她能够发现并且了解身体内的不同部位的疼痛区域, 就像一个热切的看护员奔波在国内不同的地方, 同时照料三四个状况不佳的捐献者” [11]。但捐献器官后, 克隆人的生命并未终止, 继续处于流转之中。在汤米生命终结后的几个礼拜, 凯茜站在田间发现: “围栏边乱糟糟地堆着各种垃圾。破碎的塑料纸和破袋子的碎片, 高高地挂在树枝上, 被吹地噼啪作响” [11]。凯茜看到漂浮的未被降解的垃圾, 想象它们就是童年里所有丢失的东西, 想象汤米向她走来。“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指出, 社会是一种临时的、不断重组的联结, 其中不仅包括人类之间的互动, 也包括各种物质实体、技术和符号构成的网络所实施的行动, 在不断重组和再装配过程中, 差异元素和不协调者以异质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形成块茎的多元体” [23]。聚集在一起的垃圾隐喻着克隆人身体的“再生”。克隆人被社会抛弃后, 依然以另一种生命形式存在着, 呈现一种网络化的关联状态, 流向其他物种的普遍生命力“佐伊”, 最终生成其典型的后人类主体性。

5 结语

克隆人作为人类的技术产物, 尽管有着与人类相同的身体和相似的情感, 但其自产生之初便被定位于被人类利用的工具地位, 使其具有了被给定的异化身份和工具化身体, 从而处于主体性缺失的状态。石黑一雄的小说《别让我走》即是对克隆人之主体性的思考。通过描写克隆人群体在异化身份和工具化身体的双重规训中所处的主体性缺失的生存状态; 他们在多维时空中的解辖域化游牧和与其他生命形式的联结而展现的对自身主体性的追寻; 以及他们在捐献器官、生命终结后以聚集在一起、无法降解的垃圾意象所隐喻的生命的流转而体现的普遍生命力“佐伊”的生成及其标志的主体性建构, 石黑一雄在小说中表达了对人类利用科技所制造的克隆人这种后人类形象的主体性问题及其产生的技术与生命伦理问题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Byer, T. 2019. Speculative Fiction, Memory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J]. *European Journal of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Studies*, 3(1): 70-7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567279>
- [2] 安婕. 多维时间与伦理身体——石黑一雄《别让我走》中的后人类伦理[J]. *外国文学*, 2021, (2): 46-57.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21.02.007>
- [3] 庞好农. 悬念性 反讽性 阴冷性——评《千万别让我走》的幽默叙事特色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5, 340(1): 127-135, 149-150. <https://doi.org/10.13458/j.cnki.flatt.005082>
- [4] Vichiensing, M. 2017. The Othering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J]. *Advanc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ry Studies*, 8(4): 126-135. <https://doi.org/10.7575/aiac.all.s.v.8n.4p.126>
- [5] 杜明业. 《别让我走》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J]. *外国文学研究*, 2014, 36(03): 60-67.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s.2014.03.008>
- [6] del Valle Alcalá R. 2019. Servile Life: Subjectivity, Biopolitics, and the Labor of the Dividual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J]. *Cultural Critique* (102): 37-60. <https://doi.org/10.5749/culturalcritique.102.2019.0037>
- [7] Christmas, A. 2023. Love as Subjectification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J].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65(4): 392-411. <https://doi.org/10.7560/TSLL65405>
- [8] 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M]. 刘宇清,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298.
- [9] 罗西·布拉伊多蒂. 后人类 [M]. 宋根成, 译. 河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 57, 86.
- [10] Braidotti, R.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
- [11] 石黑一雄. 《别让我走》 [M]. 朱去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31, 39, 240, 32, 247, 74, 62, 257, 6, 7, 8, 8, 14, 120, 120, 120, 60, 67, 6, 172, 172, 194, 194, 205, 205, 205, 205, 243, 241, 252, 216, 264.
- [12] 支运波, 张扬. 后人类语境下《别让我走》的身份建构解读 [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3(05): 54-58. <https://doi.org/10.16207/j.cnki.1001-5957.2016.05.011>
- [13] Snaza N. 2015. The Failure of Humanizing Education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J]. *Lit: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Theory*, 26(3): 215-234. <https://doi.org/10.1080/10436928.2015.1062344>
- [14] 吴玲英, 聂青. 《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后人类儿童主体及其主体性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5(06): 46-51. <https://doi.org/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6.007>
- [15] 德勒兹, 加塔利. 千高原: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M]. 姜宇辉,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441.

- [16] 余薇. 后人类主义视域下黑人女性主体的“生成”研究 [J]. 外语导刊, 2024, 47(03): 39-46+159.
- [17] Phelps EA, Sharot T. How (and Why) Emotion Enhances the Subjective Sense of Recollection [J]. *Curr Dir Psychol Sci*. 2008, 17(2): 147-152.
<https://doi.org/10.1111/j.1467-8721.2008.00565.x>.
- [18] Braidotti, R. *Nomadic theory: the portable Rosi Braidotti* [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60.
- [19] 孙云霏. 游牧主体与关系伦理——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主体理论 [J]. 上海文化, 2021, (04): 25-34.
- [20] Shin, N. Reimagining Community at the Open Marshland: Ecocritical Anti-Bildung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J].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2023, 65(4): 374-391. <https://doi.org/10.7560/TSLL65404>
- [21] 杨建国. 生命的游牧——罗西·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批判理论 [J].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2(04): 66-75.
- [22] Braidotti, R. *Transpositions: on Nomadic Ethics*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37.
- [23] 张秀丽. 《别让我走》中废弃的生命与共同体 [J]. 山东外语教学, 2025, 46(01): 90-99.
<https://doi.org/10.16482/j.sdwy37-1026-2025-01-009>